

輿論

第二卷 第六期

半月簡評

為什麼還不釋放政治犯？(風)

矛盾的措施(風)

和平之真諦(无名)

美國外交的墮落(文)

血淚的呼籲(无名)

論壇

為社會主義的名詞作一詳解

怎樣繼承傳統的文化(上)

美國武裝日本的現階段

通訊

激盪中的南京政局(南京通訊)

危機四伏的川康(成都通訊)

解放區的貿易制度怎樣？(香港通訊)王冰

日暮鄉關何處是(杭州通訊)諸葛晴

贈閱

發行兼
主編者
出版者

余宗范
輿論半月刊社

地址 上海吳淞路三二二號
電話 四六五〇

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中路二二二號

聯合書報社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訂閱價目

預三月(六期) 1.200元

半年(十二期) 2.400元

全年(廿四期) 4.800元

外埠郵費郵費隨加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半月簡評

為什麼還不釋放

治犯？

本年一月二十四日李代總統發表他的七項措施，其中第四條是「釋放政治犯」，第六條是「撤銷特種刑事法庭，廢止特種刑事條例。」

事隔一月有餘，許多政治犯還沒有釋放，特種刑事條例事實上仍舊存在；而且各地秘密捕人之事，更變本加厲，與日俱增。

為什麼七項措施不能實行？第一：因為許多官員不服從李氏的命令；第二：因為李氏沒有充分的權力。例如已經「管教」十餘年的張學良，至今尚未釋放，據說是「技術問題。」這真是「神乎其技」「法術無邊」了。

本月九日上海有被捕政治嫌疑犯卅二人的家屬代表，到市政府謁見吳市長，要求釋放被押的家屬，沒有什麼結果；大概又是一個「技術問題。」

軍警隨意捉人，有時捉去了既不依法定罪，又不釋放，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國家！

可憐的中國法律，被「技術問題」搗毀了！可憐一個元首的命令，被大大小小的「技術家」取消了一！（風）

矛盾的措施

三月八日孫科在立法院院會上宣佈他「光榮的辭職」，同時做了一篇最後的施政報告，其中有一致：

「關於徵糧問題，這也是由於抗戰而加於人民的負擔，當時雖然收到很大的效果，但是流弊也很多，同時這種負擔，是直接加於生產農民

的本身。我與財政部商量的結果，決定徵借部份，卅八年度暫時停止，這已在最近公佈的財政改革方案中發表了。」

謝謝政府「賢明」的政策，把「流弊很多」的徵糧辦法取消了，全國農民，能不「感激涕零？」

可是在同一財政改革方案上，規定貨物稅徵收，「棉紗火柴水泥捲菸食糖等照規定稅率徵收貨物，其不便徵收貨物者，得以貨物計數，折價繳納，鹽稅亦照前項辦理。」

一方面取消糧食徵收，另一方面開始貨物徵收，把「人民的負擔改變一個方向，把流弊重演一番；於是，所謂「賢明」的政策，結果成為「矛盾的措施。」

貨物稅徵收，直接增加工廠的成本，間接增加了人民的負擔；更證明連政府也不相信它自己所發行的貨幣了！

然而畢竟是對於某一部份的人是有利的：如經手徵收的人員，保管倉庫的人員，和折價變賣的人員，尤其是管理財政的大員。

「肥水不落外人田，」財政部長萬歲！（風）

「和平之真諦」

俗語說：「官司輸了，道理出來了。」「政治協商」，「和平建國」的大計給破壞了，「撤亂一

「土匪」的大戰被打敗了，「和平之真諦」就出來了。雖然出來太遲了一點，究竟「和平」二字從來不許人輕易出口的連自己也輕易出了口，而且已經找得了「真諦」，真是一件大可喜悅的事。失敗為成功之母，這次的和平運動該可以成功了罷。果然成功，時間也許還不算太遲。我們要為人民爭取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成功慶賀，同時也該為偉大的政治家大澈大悟，從事和平運動的成功慶賀！

據報載中央社臺中一日電：「南來臺中居住之

陳立夫氏，頃就全國人民所呼籲之和平一詞加以解釋。渠謂則相親，異則相對，強不凌弱，眾不暴寡，乃和平之真諦。渠稱能容所異，趨於大同，是和合之道。不恃強凌弱，恃衆暴寡，方可謂之平等。是以真正和平之建立，宜以斯兩端為基礎，絕非出諸武力，以侵略手段使對方屈服者所可擬。吾人希望真正和平，政府並場誠謀和，倘中共亦有此誠意，則和平自可實現。……」不錯，「和平之真諦」是可以這麼說有的，問題只在雙方有無「誠意」。

不錯，李代總統的幾點「祥和措施」宣佈的時間還不算太長，居然也做到了百分之幾罷。政府雖還不肯說不再打算作戰了，却不妨說是「備戰謀和」，「能戰能能和。」可見這一方不但有了「誠意」，而且在「場談」。那嗎，問題落在另一方，看他們有無「誠意」，而且能不能「場談」，像上次在重慶政協時代所表現的那樣了。

如果以政協的和平方式解決國事說，很顯然的舊政協時代和目前新政協時代有截然不同的。從前是雙方的衆寡強弱的比例，儘管各自計算不同，實際上還不相差太遠。加以國際上有一個所謂第三方面的盟友從中斡旋，所以協商起來，表面上還容易接近，結果總算共同簽定了並不共同遵守的等於廢紙的幾張協定。目前是雙方的衆寡強弱顯然大大地不同了。在這衆寡不侔，強弱異勢，今昔相反，主客異位的情況之下，除非非窮的弱的一方失敗了有承認失敗的勇氣，肯下退居在野黨的決心；衆的強的一方勝利了肯壓低勝利的情緒，有進居執政黨的度量；不要說彼此有無「誠意」和是否「場談」，恐怕連談也不要談，就連像前次政協那樣簽好了又作廢的勞什子都不會有！

多虧二十年來，中國有了不肯「能容所異」，

悍然獨裁，而且是「強凌弱，衆暴寡，」加緊奴役人民，加緊剝削人民的一方；逼出了不肯「屈服」，要求「翻身」，要求「解放」的廣大的人民，加緊了而且加強了另一方。雖說「和平」差不多失掉了二十年之久，到了今日，總算找得了「和平」之真諦」。能否真正誠悔過去那樣「強凌弱，衆暴寡，」不肯「能容所異」的反民主作風，和「侵略手段」，而從新拿出民主政治家所必須具有的容忍精神來覺得「真正和平」？這一個和平課題真是對於目前中國有沒有偉大的政治家存在之考驗。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要求和和平的就該趕早，不要又在一次大會戰（渡江會戰）之後，使我們善意的討論和平的文章還是落在無情的現實之後！（无名）

美國外交的墮落！

據法國新聞社東京十日電：「接近盟國賠償代表團人士十日答法國新聞社稱：中國局勢如有特殊變化，自日本獲得賠償的希望即將消失。美國對於此問題，單獨在作一切決定……」。我們奇怪一向高唱「援華」甚至將其部份物資與軍火，不惜出自由之助予中國（？）的盟邦，到了我們真正有機會接近這一境界的時候，却連中國人民從八年抗戰與苦難中換得的日本賠償物資，都有個代價，而且足見美國列強所謂「援華」不過是假仁假義，利用中國，作為反蘇的進基地地是事實。同日聯合社馬德里電：「此間美大使例十日宣稱：美國現正考慮是否借款予西班牙，以免弗朗哥政權垮台」。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明顯的是一切以反蘇為核心，兜着瘋狂的圈子，抹殺是非，不顧信譽，以與全世界的人民為敵，這正象徵美國外交政策的墮落，也正是美帝國主義者的悲哀！（文）

代郵：堯克：來信收悉，盼約斯晤面

編者

中國大學教授最足以代表士大夫文化素養的最優良的傳統。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君子謀道不謀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漢儒董仲舒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宋儒則教人「尋孔顏樂處」。直到今日，本年一二月間，大學教授每月收入竟不到一兩個銀圓。他們從抗戰以來忍受了十多年的苦難，直到活命不了，再也忍受不了，纔肯緊急呼籲改善待遇。可說他們無負於國家，無愧於先聖賢重道誼，輕功利的遺教。要不是保有士大夫文化素養的最優良的傳統能够如是嗎？

最近上海國立十院校教授聯誼會派代表向

政府呼籲，並發表社會書中說：「查當政衰衰諸公，薪給亦與公教人員相同，如果沒有不適當收入，也該如我們一樣的苦命運。可是事實上，他們有的擁有大量金鈔，有的在海外各地都市廣置地皮大廈，平日享受程度超過古代帝王。就是為他們所壟斷的國營金融及企業機構的同級公務人員自給。此以饜養之作風養肥自己，以飢餓之政策摧殘殘廢措施乖謬，史無前例。諸君聞之，當亦為之不平。乞乞予以聲援，共代呼籲。」這段文字真是和血淚寫下來的。究竟教授們的文化素養高，不失「溫良恭儉讓」的士君子的態度，說話還很公正，忠厚。不然，說到臺門官僚所壟斷的國營金融及企業機

血淚的呼籲

構的同樣公務人員與公丁茶役的每月收入，豈僅「無不倍蓰於我們」而已哉？他們的底薪不打折扣，倒比一般公教人員加上百分之三十，每逢年節還要加倍發薪，一年至少有十六個月以上的薪水。子女教育費還由機關供給。每月加發食米有在兩石以上者。再加以他更不可告人的津貼和福利補助。可以說他們的收入數十倍過於大學教授也不為過。這種不平的情形自抗戰以來，近十年間，早就如此，已是公開的祕密。這個「飽與餓的對照」真够驚人，更不要高舉他們的主管上司臺門官僚，對照對照，已經叫人感到莫大的不平，難道衰衰諸公還不知道嗎？

上海教授們這一有血有淚的呼籲發出後，又經過各院校的院長校長聯

袂督京請求，所得到的政府的反映，是從三月份起，暫照五百倍，按底薪經過折扣之後的基數發給。說是暫照，似乎還有下文，能按本月份上海職工生活指數發給薪水。可是二月份呢？難道就用一折二扣的基數只發七十五倍，至多每一子女發一萬三四千元薪金了事嗎？有些教授們一發已因無錢不能上學，上了學的呢？多半是由典當借貸得來，如何得了呢？據報載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從北京回來的話說，北京方面的教授學生及一般知識份子，從前擁護政府的，現在反對政府，比共黨還要激烈。李代總統至說，「政府平時對待他們刻薄，沒有拉攏他們。」難道教授們早已首肯自甘，澀着皇衰衰諸公拉攏？他們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只是活命，不要連改菜根，吃首霜，也還不能呀！（无名）

論壇

為「社會主義」的名詞作一詳解

夏炎德

隨着歷史性革命運動的展開，向被目為異端的社會主義愈來愈受人注目了。然而所謂「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呢？這問題不像表面那麼簡單，可用三言兩語來解答。在這裏，我願就手頭所有的文獻，對於這一個名詞作一番解釋的工夫。

「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在西文中的同義字，英文是 Socialism。法文是 Socialisme。德文是 Sozialismus。那由拉丁字 Socius（同輩同儕的）繫詞 Socialis（同輩的、同儕的）轉化而成。從詞源上看，便注重人與人間的聯繫，與孤立的個人嗜好相反。

社會主義是一個近代的名詞，它之出現祇有一百多年歷史，雖然古希臘的哲人即已有這方面的理想。這個名詞的最先應用者大概非英國人即法國人，兩方面會反覆爭論很久。法國方面稱此一術語由雷博（Louis Reybaud）在其所著「社會改良家或近代社會主義者研究」（Etudes sur les Reformateurs on Socialistes modernes）中首先應用，該書出版於一八四〇年。英國方面則引譯文（Robert Owen）之敵馬特（J. Muter）所著「揭破社會主義，或新道德世界期刊之檢閱」（Socialism Exposed, or 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 Examined, 1839）以為答辯，該書較前書先一年出版。然後法國方面發現該術語為雷博所更早採用，指出一八三六年，他在兩世界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發表一文中已有此字。英國方面再引證過文之期刊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聲明從一八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起此項術語便屢見不鮮。以上雷博與過文信徒間的爭論，英國方面認為已獲解決。不意法國方面又找出一種新證據，證明聖西門（Saint Simon）的門徒萊羅（Pierre Leroux）曾於一八三二年二月十三日在地球日報（Le Globe）上寫過「我們不願意為社會主義而犧牲人格」的話，而且萊羅也曾明白自己發明此術語。對於這種說法，過文的信徒無法加以駁回。直到近人下爾（Max Beer）在浩瀚的大英博物院圖書館搜集資料寫他的「英國社會主義史」時，意外地從一八二七年十一月出版的合作雜誌（Cooperative Magazine）上發現了「社會主義者」（Socialist）的字樣，那份雜誌是一八二四年成立的倫敦合作社的機關誌，常用以討論合作事業的，由是他斷言「社會主義」在當時係一習用的名詞。

英國之首先發明此一術語，至此乃又得一證。

對於上述的爭論，我們有兩點須予註明的：第一，「社會主義」一詞，在法國所流行的係一種抽象的術語，而英國合作主義者及過文信徒們所用的則含有具體的意義。其次，在法國，「社會主義」用以與「個人主義」作對詞；在英國，則用「社會主義者」以與「資本主義者」相對照。換言之，在法國「社會主義」一詞是社會學上的用語，其意認為整個社會高於個別成員；在英國，「社會主義者」一詞係經濟學上的用語，意指資本與土地之集產，與其權屬於私人所有者相反。由此可知，「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者」二詞，其來源既各殊，含義亦異致。不過經過不久的時間，二者各自跨越海峽抵達彼岸，「社會主義」的名詞便在英國被習用，同時法國也發現了「社會主義者」的字樣。

然經這樣交互應用以後，詞義便顯得曖昧與混淆，這也是自然的結果。無論在英國或法國，當任何人提及「社會主義」時，他必須附帶說明對此詞之觀念，任何人稱呼對方為「社會主義者」時，他必須說明究何所指。無怪在前世紀末尾哈科特（William Harcourt）要說：「我們都用着『社會主義』這個名詞，而對它連最微小的肯定概念都沒有。」中山先生在講述民生主義時也會有這樣的話：「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究竟不知那一種是的確。」

實際上，社會主義涵義的不明與無定，還有更多的人抱着同感。如麥肯西（J. S. Mackenzie）說：「社會主義是一個最鬆懈的術語。」賴惠來（E. Laveleye）且說：「我們從未發現此一術語的定義或對此字之精確說明。」同時期的居友（Yves Guyot）、夏非理（Albert Schaffle）諸氏咸有此感。它在各方面的多歧性，從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倍爾（August Bebel）說得很周詳：「實在這是一種完全的世界哲學：在宗教上，它的意思是無神論；在政治上，係民主共和；在產業上，係普遍的集產主義；在倫理上，係無邊的樂天主義；在形而上學上，係自然主義的唯物論；在家庭中，幾乎將家庭的束縛與婚姻的累贅完全解放。」還有，社會主義往往是因入而異隨緣而化的，此點英人慕耳（Ramsay Muir）描寫得最生動有味，他說：「社會主義是一種像變色蜥蜴一樣的主義，它因環境而改變其顏色。在街道轉角處及俱樂部內，它是執手可熱的猩紅色的階級鬥爭，對知識份子，它的紅色旗而變為褐黃色；對熱

情份子，它又變成極可愛的玫瑰紅色，在牧師擊中，則又變為真潔的白色。」

至此我們要問：社會主義的意義是什麼？或社會主義之宗旨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嫌其少，倒是覺得太多了。一八九二年巴黎有一家費嘉樂雜誌（Le Figaro）檢討這問題時，曾提出六百個以上的定義。一九二四年英國第一屆工黨政府刊行了一本名叫「社會主義是什麼？」（What is Socialism?）的冊子，由葛理斐斯（Dan Griffiths）彙編，所蒐集的社會主義定義有二三六個之多（大抵以英國人為限），如說：社會主義是一種科學，一種宗教，一種態度，一個原則，一組學說，一種理論，一種制度，一種組織，一種社會形態，一個信心，一種精神，一種哲學，一種運動，一個名稱，一種信仰，一種趨勢，一種渴望，一條生活的道路，一個要求，一個進程，一個觀念，一種感覺，一種風氣，一個課題等等。

稱為社會主義一詞的發明者萊羅，不過把它說作「一種個人為社會而犧牲的政治組織，」未免空疏而不着邊際。古典派經濟學集大成者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晚年傾向社會主義，曾這樣解釋：「社會主義的特質，在乎由社會全體共同掌握各種生產機關及其要件；並且按照社會的公律，共同分配一切生產物。」這便已指出了生產與分配社會化的原則。科學社會主義的始祖馬克思，不曾將社會主義正式下一定義，僅在資本論第二版序中說：「我認為社會主義的理想，除了物質世界在人類心理的反應並轉化為思想的形式以外，並沒有其他的東西。」而馬氏之哲法人拉桑格（Lafargue）曾言：「社會主義不是改良家所唱的歌。社會主義之發生實由於大家看到在經濟發展的程序中，現行制度已瀕於危殆，資本在過去為個人所有不久將入於勞工團體之手。所以社會主義乃歷史的發見。」從唯物論的觀點進而說明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後者當足為前說之引伸。

在十九世紀下半期，有些宗教家對社會主義的解說實零上祇是一種美的憧憬。例如鮑文（J. W. Bowen）說「社會主義是黑暗世界之光」。有人或將這道光與幻想有什麼區別呢？同樣韓浦遜（W. Hampson）更強調地說「社會主義是反抗黑夜的陽光」。但有人可以反駁黑夜中該只有月亮呢？查理頓（H. C. Charlton）以說教者的姿態稱：「社會主義就是那種社會形式，允許在地上建立天國。」這樣我們可以說為什麼不更進一步將人間搬上天堂呢？諸如此類的說法，除了表示他們主觀的願望之外，沒有任何內容可言。

倒是有位威司主教（Bishop Westcott），在一八九〇年某個宗教大會上宣讀一篇論文，把社會主義當作一種高尚的生活理想，指斥一些有玷社會

主義令譽的行徑會引起廣泛的注意。他說：「若置其歷史的關係不論，我冒昧地以為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理論，而可說是一種生活理論。在這意義上，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相反；祇有和個人主義對較，社會主義的本質纔能被正確地認識。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相當於對人類兩種相反的看法。個人主義以為人類是由不相關的敵性原子所造成，而社會主義則認為這是整一的機體，由相互依賴的分子結合而成。所以社會主義在方法上與目的上都不同於個人主義。社會主義的方法是合作，個人主義的方法是競爭。前者以為人類為着公共目的而工作，後者以為人類為着個人利益而工作。個人主義之目的在贏得個人利益，財富，地位或名譽。社會主義在尋求將來每人力量能充分發揮的生活組織。個人主義則主要地在尋求每人特殊慾望的滿足，希望在追求私利而獲致公眾福利的結果。」這樣將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一對較，對於它本身的認識便清楚多了。

在德國講社會主義者的解說中，我獨取華古訥（Adolph Wagner）教授的定義，原文如此說：「極端的社會主義，亦即近代科學的經濟的社會主義，是一種與現行制度相反的經濟與法律組織。它要求物質的生產要素（土地與資本）為社會集體所有，不能像今日那樣為私人所有。……生產不能再依資本家所應有的需求做標準。因為若依照私人應有的需求而生產，則人人存投機僥倖心理，生產漫無限制，生產品之分配亦全恃需求律之偶然湊合。社會主義需求先確立消費者之需求量而計劃生產，由政府機關測定適當的生產量。經營生產的機關將為國家或市政當局或合作團體，生產品分配受供求律支配時，應按目前公平得多。」他所謂極端的社會主義係與保守的社會主義比較而言，當屬不折不扣的真社會主義。解釋的內容還算周詳，着重經濟的方面，並已講到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之應用。不過說將來生產品分配仍依照供求律，不免將市場法則運用到錯誤的境地，在社會主義下的分配原則並不如此。

德國非社會主義權威學者中對社會主義有研究的，在較前有夏弗理，在較近有宋巴德（Werner Sombart）。夏弗理在其鉅著「社會主義之精義」（Quintessence of Socialism，英譯本）中提出社會主義之目的為「公有資本制度代替現行的私人資本制度，即投機性的生產方法，社會僅靠個人自由競爭來保護，而今後在生產機構歸人民全體基礎上，將採用新的生產方法，並統籌國民所得之分配。」宋巴德在「德國社會主義」（Deutscher Sozialismus）一書中會將社會主義作了一個界說：「我所瞭解的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生活的境界，其中個人行為根本上須受服務性的範式所決定，而這種範式又以為為政

治與基礎的理性為本源，法律則為其外形」。後一種著作發表時間雖晚，不過因為說明落入形式主義的窠臼，反不如前者之能夠到社會主義之本質。

德國社會民主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與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 的糅合，他們企圖用比較溫和的方法達到目的，故該黨理論家考茨基 (Karl Kautsky) 把社會主義解作「經濟生活的民主組織」。稱為修正派的柏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則把它解作「合作的社會秩序的境界，或走向無秩序的運動。」以合作代替階級鬥爭，以民主代替無產者專政，在策略上是馬克思主義的退却，但與當時德國統治者的壓制亦有關係。該黨在一九一九年所發傳單上說：「社會主義就是全體為全體的計劃經濟。它要建立共同經濟以代替過去成千累萬的個別經濟，這共同經濟在計劃地增進財物生產。」這裏指出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的統一性，與蘇聯布爾什維克差不多是同時的。

英國斐彬社 (Fabian Society) 所倡導的社會主義，完全是英國的，從他們自己的祖先及取思想源泉：他們受過文一輩道德精神的薰陶，又本彌爾、耶力斯 (Jevons) 的經濟理論加以發揮。該社元老蕭伯納 (Bernard Shaw) 曾作一簡單的社會主義定義道：「社會主義完全廢除私有財產制度，將其轉化為公共財產，並將所產的公共所得平均地無差別地分配給全部人口。」(見 Socialism: Principles and Outlook) 這是一般性的解釋，對於斐彬社會主義的特點我們可以看章伯 (Sidney Webb) 的說明：「我們否定普通對社會主義的假定，即不屬叛亂主義便屬空想主義，我們當自己發見並教育人民如何將英國實地轉化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見 Socialism: True and False) 事實上，他們確是從這樣的社會主義觀念出發，研究問題貫輸思想，為工黨日後施政打定了理論基礎。這是無怪的，以英國這樣經濟多士。人民智識水準高而憲政早上軌道的國家，走這一條道路是放順當的。

歐美資本主義經濟學者，過去對於社會主義是諱莫如深的，現在大勢所趨也不能不偶然討論及之，也有把它當作專題來研究的，不過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解還是膚淺得很，所下定義簡陋的多。例如英國財政金融專家霍曲萊 (R. H. Hawtrey) 說：「社會主義乃一種經濟問題的解決法，基於國家的權威，而不基於市場的動機。」哈佛大學奧籍教授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 以類似的口吻說：「社會主義是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中公共機關有管理生產程序的全權。」這種說法只抓到社會主義一兩個要點。另一個新奧國派的權威密爾臣 (Ludwig von Mises) 教授寫「專書「社會主義」(Die Gemeinwirtschaft, 1932) 英譯本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1926) 對之作分析的批評；他說：「我對社會主義的定義是，它的改革目的在建立一個生產工具社會化的社會。……」又說：「社會主義之目的在將生產工具從私人所有變為有組織的社會或國家所有。」又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所有生產工具全由有組織的社會所控制。祇有這種是社會主義，所有其他定義都是錯誤的。」他所反覆說的話實際上除一般人所指社會主義下生產工具公有一點外沒有別的。倒是我覺得英人狄根孫 (H. D. Dickinson) 在丘普中的定義比較完備，他說：「社會主義是社會的一種經濟組織，在重要而物質的生產工具為全社會所公有，而由代表全社會並向社會負責的機關按照一計劃的經濟計劃來運用，每周社會的分子都能依據平等原則享受這種社會主義計劃生產的物產。」這裏面社會主義的主要內容已被揭示出來。

以上已經把社會主義這名詞的源流，各派人士從各種角度上對它的界說，作了一個分類的介紹並說明。至此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應當作一綜合的界說了。依我們說來，社會主義是整個社會組織的一種方式，主要的是一種經濟制度，現在已由理想經由運動漸漸地建立起來，在其中社會集團的利益居於支配的地位，不代表私人利益為目的。凡民生所依恃的重要生產材料悉歸社會國家公有，由代表人民的民主政府負責組織與管理，依照計劃經濟的方式從事有效率的生產，並將其生產成果依照公平合理的原則分配給人民共同享用，以保障他們生活安全並幸福。對於這固定定義的要點，以下試再分層作進一步的解說：

第一是生產工具公有。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是財產公有，或更具體的說是生產工具收歸社會公有。在過去各種經濟組織中，生產工具部由於私人掌握造成不平等的階層，尤其在資本主義下，生產工具給少數資產階級獨佔後，大多數勞動者失掉獨立謀生的憑藉，不得不賤售勞動力以圖存，可見生產工具公有實為剝削之根源，必須將其社會化 (Socialisation) 或說化為私為公。社會化可以是有國有化 (Nationalisation) 或市有化 (Municipalisation)，看它們性質宜屬，中央或地方而定。收歸公有的財產應限於生產工具或生產財物或資本財物，如土地、森林、礦產、鐵道、大規模的工廠與貴重機器生財等。小的僱用員工較少的工廠與簡單工具仍許私有。至各人所有的消費財物，如住屋、傢俱、衣飾、書籍之類，因不足以妨害他人的生活，均不在內。若濫享用過度，儘可出之以徵稅的方法。至於如何收歸公有的方式，有的無償沒收，有的作價收買，其間大有急進與緩進之分，則須視情形來抉擇。

第二是重要產業公營。生產工具既歸公眾接管，繼着便須政府來經營。凡是全國重要生產事業，如基本工業 (或說關鍵工業 Key industries) 國防工業

交通運輸事業以及都市公用事業等，有的關係整個國家安全有的關係全體人民利益，概列入公營（國營、省營或市營）範圍，不讓私人染指，免得國計民生因私利而受妨礙。其他不在這範圍內仍任私營，因生產事業無窮，而國家實力有限，甚需私營事業來補充。只要其能受公家控制，不違背公家利益，無妨聽任私營。公營的部分在國家手中，政府代替了原來企業家的地位，社會主義政府的經濟實權擴大，必須有健全的組織，大批廉能的幹員，財務管理尤其要嚴密，機能使不虧本而使事業發展。公營事業的方針應遵照民意機關的決定，而經常業務却須發揮高度的效率，不能蹈官僚主義（Bureaucracy）之弊，還貪污無能之輩。

第三是為人民使用而生產。社會主義的生產為公眾使用（Socialist production for public use），不像資本主義的生產為私人牟利（Capitalist production for private profit）。資本企業家規劃生產時，決定作何種生產投資，生產數量若干，祇著眼於本身的利潤，其他一切都不考慮。社會主義社會的主體是大多數人民，其代理經營的機關用不到為本身賺錢，完全以公眾福利為目的。當局在計劃生產時當分別先後緩急的次序（First thing first），莫急於製造民生必需品，然後及於其他，奢侈品浪費物資儘可不生產。如有些人連粗茶淡飯都沒有着落時，誰也不該享受山珍海味；當邊省及孀少女還沒有褲子穿時，不許有跳舞裝游泳衣製銷。有限的生產資源務必用到人民最需要的生產部門。

第四是計劃經濟之運用。社會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經濟制度，計劃經濟為其政策之運用；前者是體，後者是用，其關係正如資本主義之與自由經濟一樣。自由經濟實係經濟上之無政府主義，私人企業家各自為謀，各種經濟勢力往往不能協調，結果失衡與恐慌時見，所謂價格的自動調節作用只是逗人入迷的神話。社會主義者不相信市場機構會自動創造均衡，惟有信賴人類有意識的作為，用計劃經濟的方式，使各種經濟勢力得到有機的配合，造成生產與消費間真正的均衡。全國每年的生產有預算，先定目標再設法控制數字（Control figures），彷彿財政收支之有預算一樣。近年來資本主義國家亦嘗試以計劃經濟解決困難，但因生產工具仍屬私有，生產事業仍由私營，政府至多只能加以控制，無法施行廣大的計劃。體用是一元的，全面計劃經濟祇有在社會主義下機能行之無礙。

第五是公平的分配方法。社會主義尤其勝過資本主義的地方在分配公平。按資本主義下所行之機能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財產所得遠較動

勞所得為大，有產者藉控制財產實行剝削，過其豪闊的寄生生活，而辛苦終日的勞工往往不得一飽，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社會主義者相信勞動是價值的源泉，不許有私有的生產工具，不准有坐食的人，祇有人人從事勞動，全年的國民分益金（National dividend）便在生產人民中分配，分配的方式不能依機械的平等原則，不問工作之勤惰巧拙待遇一律，因為這樣將把塞求進之門，最好的辦法是各人的酬勞依他們對社會的服務價值來定。為了不使生活方式相差太遠，防止將來再生貧富距離，物質報酬在某一限度以上不妨給以榮譽的報酬。

社會主義的涵義在上面我們已經解釋清楚，不過因為這個名詞很容易和其他類似的名詞相混，故此有再加以說明的必要。普通人常以為社會主義與社會改良（Social reform）是很接近的，其實二者的目的有顯著的差別：前者要將現社會根本改造過來，後者對局部改良已覺滿足。社會改良家相信我們祇須將生產財產有主的權力加以限制，許多私產的弊害即可免除，他們的所有權與管理權不妨仍予維持。社會主義者並不同意此點，他們認定財產所有權從私人手裏交出是一切經濟改造的先決條件，少了這個便不成其為社會主義。有些社會改良家認為財產不過是一束權利，如果私人從它所得的利益減少，就是將這些私人權利漸漸抽出來歸社會，如此久後即能使經濟社會化，故說社會改良是傾向社會主義的。不過近代社會主義有它一定的目的與步驟，任何局部改良還沒有變成社會主義的可能，而且少份的改良有時反會延誤全盤的改造，在觀念上最易令人迷亂方向。

現在再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Communism）是否是同一種主義呢？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是否是同一種人呢？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又是共產主義，犯着邏輯的錯誤。因為據我們所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僅有程度之差，且有性質之異：第一、社會主義其實就是集產主義（Collectivism），將私人財產社會化，集中於國家管理之下；共產主義像它名詞所表示的，財產是共有的，利益是共享的；前者在私化為公，後者已無分公私。第二、在社會主義社會，舊有的階級正在被清算，還沒有消滅，過去的既得利益階級尚存陰險復辟的可能，故須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予以鎮壓，在共產主義社會，階級已根本不存在，再也沒有壓迫與被壓迫的事實。第三、社會主義下產業公有公營，國家實行民主集權制，政府發揮應有的最大的權威；共產主義下假定一切已上軌道，無須政府統治，故國家趨於式微，國界終歸消滅。第四、社會主義社會不過將生產財產收歸公有，而共產主義社會則並消費財產亦歸共有，即俗

所謂「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有觀念已根本沒有。第五、社會主義經濟的分配原則是「各人依其希冀報酬而努力，各人依其生產力而分配物品。」(Effort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desire for Compensation; goods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productivity) 共產主義經濟的分配原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Effort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goods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一般馬克思主義者將共產主義分成初期與高級兩個階段：初期的共產主義 (First phase of Communism) 仍帶有舊社會的胎記，其特色為(1)生產力未充分發展；(2)勞心與勞力的界限尚未消除；(3)按照勞動而不按需要分配；(4)資產階級法律的遺骸猶存(5)階級、主屬、國家尚存在。高級的共產主義 (Higher phase of Communism) 的特色是(1)生產力已無比的發展；(2)靈活的創造的與絕對自由的勞動；(3)分工——即終身「職業」與勞心勞力之對立——的打破；(4)階級與主屬界限的消除；(5)生產不復缺乏之，可按各人需要而分配；(6)法律與國家的最後遺骸消滅。這所謂初期共產主義即指社會主義，高級共產主義係指共產主義本身。(參閱 Marxism and Modern Thought, by Bukharin, Deborin and others, 1935, pp. 85—86) 英國權威政治學教授拉思基 (Harold J. Laski) 解釋共產主義說：「當作一種理想，它旨在實現一無階級的社會，那時由於生產與運輸工具

公有，階級已歸消滅。當作一種方法，它相信要達到這種理想，祇有靠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為轉變期間的有效手段。」(見 Communism, p. 11) 這所謂方法便是社會主義，理想便是共產主義。

史達林在某次演說中將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解釋得很清楚；他說：「社會主義的原則即：在一社會主義社會，各人依照他才能而工作，但領受消費物品則不依他的需要而依他為社會所做的工作。」他說明這表示勞工階級的文化與技術水準還不高勞心與勞力的界限依舊存在，勞動生產力之高度尚不够保證豐富的消費物，故祇能依工作而不依需要來分配。又說：「共產主義的原則即：在一共產主義社會，各人依他才能而工作，但領受消費物品則不依他們所做的工作，而依照他文化發展的個人的需要。」他說明這表示勞工階級的文化與技術水準已很高，勞心與勞力的界限消除，勞動生產力已達到很高的水準，能够供應絕大數量的消費物品，使社會能依照其分子的需要而分配。」(Speech at the First All-Union Conference of Stakhanovites, 見 Problems of Leninism) 總之，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的社會制度，它已從資本主義母胎中蛻化而出，但尚留有資本主義的殘餘，等到這些殘餘克復以後，即入於更高的共產主義的階段，那是一個生產力發達物質豐富生活很自由的社會，同時必然地又是一個無統治無國界四海同胞的大同世界。可見共產主義的境界很高，我們不用害怕，只怕它一時不易實現。

怎樣繼承傳統的文化(上)

蘇淵雷

近人好言「國粹」，以為凡屬固有，未有不好，因而以「保存國粹」為復古保守的幌子，對社會文化的進步，很有阻礙。五十年前，近代啓蒙思想家之一，宋平子先生，曾寫過一篇「國粹論」，提出「國權」一名詞以為對。開首就說：

「於論理學，凡名詞有平對，有反對。國粹哉！國粹哉！粹與權為反對，是故宋術敢創造其反對之名詞為「國權」矣。粹之界說，以有益於其社會者為斷，權之界說，「以有損於其社會者為斷。」又曰：「且今之人有恒言，

皆曰保粹！保粹！夫對於粹之尚存者之一方面，則可言保；若對於粹之已亡者之一方面，則所謂保者無着落，而非言復不可矣。……對於權亦應有二主義焉，則謀業也，謀業盡也。」

當時一般自命衛道，主張復古者，動曰保粹保粹，何嘗能知粹權之有別？其於粹之尚存與否，權之盡棄與否，更屬茫然，所以平子先生造此論以正之。

此一議論，在我們今日高唱繼承文化遺產之際，仍不失為一可貴的指示。現本此觀點，將我們傳

統文化中應當繼承和發揚光大的，試論如下。

一 政治觀念

我國古代的政治論，要以儒家為較平實，而其精意所寄，則在：

(一) 夷夏之防。春秋道名分，尤在嚴夷夏之防，大復仇之義。公羊傳稱「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這是種族大義之發端。意謂天下未至「升平」「太平」之世，民族的界限，未可泯滅，親疏遠近，「一定程度，不得逾越，等到

夷狄進至中國則中國之，那時內外一統，世界大同，「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也就不分夷夏了。但在未到大同之前，仍須「尊王攘夷」，以今言釋之，就是「擁護中央抵抗侵略」的意思，這是民族主義的第一解。

至於「大復仇之義」這一思想，在清末曾揭起興漢滅滿的大旗，影響民族革命很大。這原是出於莊公四年齊襄公吞滅紀國一條。此條在經文中，書「紀侯大去其國」，於齊未說滅，於紀未說奔。於是左傳解之為「紀為齊附庸，而奉其社稷，故不曰滅，不見追返，故不曰奔，大去，不返之辭也。」公羊傳則解之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至於襄公何以得稱賢？則因其九世祖襄公，曾被紀侯之先祖，進讒言，見殺於周。襄公此次滅紀，因係復九世之仇，所以孔子於春秋不書滅，寓贊美襄公之意。此種復仇正是春秋大義，當時興漢滅滿，恰好借題發揮，揭為檄戰，七氣大為鼓舞，結果民族意識深入人心，而滿清遂以顛覆了。光復舊物，革命復仇，這是民族主義的第二解。

總之，夷夏之防，實是民族主義的真精神。傳稱伊川被髮，君子與歎；孔門童子雖羞稱五霸，孔子却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正因管仲輔佐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實行尊王攘夷的緣故。

(二) 王霸之分 孔孟的政治哲學，以仁民愛物為體，公天下為用，而於王霸之界尤嚴。蓋霸以「力」而王以「德」，政為不忍之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則民易使而百姓以安。孟子發明此義，最為精闢。他說：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

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贖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梁襄王卒然問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君不行仁政，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許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後世若朱子和陳龍川，亦有王霸的辯論，大抵以聖賢為治，一本天理，故為王道；英雄創業，純重功利，故為霸道。

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講演中，說民族以自然力而成，近於王道；國家以武力而成，近於霸道，亦是此意。然據亂之世，欲求獨立，有時亦須兼用霸術。所以朱陳之辯，言各有當，未可一應論。太炎先生說得好：「王道安民，霸道保族，」安民但求仁政，保族則須國防。所以社會主義國家，亦從事擴張軍備，以鞏固其領土，惟目的在防禦，不在侵略；此則與法西斯國家專以侵略為事者，不可同日而語了。

(三) 義利之辨 孔學真精神，三者之中以此為最嚴。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正是學者入德最初法門。後來陸象山在白鹿洞書院，曾專拿這兩句話來教導學生，一時聽者莫不悚然動心，朱子且說他「所發明數暢，懇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云。近人歐陽意老居士嘗就此點，大加發揮。他說：

「能使其國必亡而無救業者，偷與私也。能使偷私之禍深銀而不拔者，鄉愿也。求生則害仁，謀道不謀食，而鄉愿同流合污，奄然媚

世。積習中於，豆羹單食是圖，而何有於國？大廈將傾之勢，而聊樂我員，流血百萬，乃視若無覩，聽若無聞，若之何其救之也？疾雷破山風振海，儻足以動之？烈日當空，儻足以明之？其必曰孔子真精神，嚴之以義利之界也歟？」(論孟課敘)

義利之界明，譬如播種，然後始可以言耕耨。陽明有言：「不扶其根，日滋灌培，但培其惡。」是則不欲為人則已，如欲為人則必學聖，不欲學聖則已，如欲學聖，必辨義利以端其趣。鄉愿則不然：謀食不謀道，舍義而取生，既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凡人又樂易於習俗，而難有出類拔萃之志，如是輾轉相承，無非鄉愿。所以孟子直指其立足為「閭閻媚世」，又直斥其毒害為「德之賊」，可知其深惡而痛絕之甚。

上述夷夏之辨，王霸之分，義利之辨三者，自是民族文化建立的準繩；此外若禮運大同之教，儒行剛毅之氣，亦為孔學真精神所寄，以世人多知，所以就不詳及了。

二 社會倫理

人羣進化，始於飲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一切倫理的規定，政法的起源，皆不離此。我國文化號稱倫理的文化適應當時農業的社會。在這方面，以儒家為最當行出色。

(一) 達情適欲 儒家的禮樂論，實以達情適欲為本。因為人類情欲的流露，如不合乎適當的節度分限，必至失出範圍，與人或與己之別方面相衝突，而引起種種的不安。所以先子制禮，以節人情。禮運篇說：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

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節之，舍禮何以哉？」荀卿亦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樂記則稱揚其旨說：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物之感入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而有悖逆詐偽之事，有淫佚作亂之事。……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

這三節，說明禮樂之興起，最為精闢。禮自外都規定人的行為，使趨合理；樂自內心調節人的情感，使達中和。禮所以節人之情，樂所以和人之聲。樂記又說：「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蓋禮樂防範於未然，刑政施行於事後，求治雖同，而治道各異。禮樂含有暗示的教育の意味，刑政則純是直接的，剛性的執行。所以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總之，禮樂論的本身，深合詩的意味，若去其繁縟，簡其儀式，正是政治之法門，可立人生的大本。惟末流極端形式，不免虛偽；孔子已有「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的論調。墨子的「非樂」，「薄葬」，可說是當時沒落貴族偽禮治的反動。但墨子非樂薄葬，似又太偏，不近人情。竟竟老居士說得好：

「至愛者誰逾父母？大事者誰逾送死？真痛迫切之益，桐棺三寸掩不及泉，三月無事，傷情無奈何，又備其情於喘息未定之際，與其

生也毋寧死。動感以樂，奮發以樂，鼓勇以樂，赴湯蹈火以樂，宣戰以樂，通幽以樂，使民久而不忘以樂，季札聞樂，判十五國之治亂興亡，樂固可非哉？」（覆張溥泉書）

是知禮樂之源，起於情欲，養生送死無憾，為王道之始，而禮樂實為其大用。我國原為禮教之邦，移風易俗惟此是賴。自孔學變質，轉為專制君主作廢世之術後，而禮崩樂壞，未有興起。歐美社會進化雖較晚，然日趨文明，人人守法，處處溫情，深符禮樂之治。怪不得宋平子先生有見歐美憲政之美，竟至淚涕洟下而說道：「素王之志今乃行於海外哉，今乃行於海外哉！」我國近來婚喪儀禮的改訂，交響樂，歌詠大會的嘗試，想是禮樂復興的起點，希望多保留一點詩的成分，力求擺脫宗教的形式，或可得生活秩序之最高的和諧了。

（二）兼愛利他 墨子為我國古代最道地的樂利主義者，其哲學思想，重在功利二字。嘗設立著有三表，而以「發為刑政，觀其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為估定一切價值的標準。到底什麼是人民的大利，墨子則以狹義的功利觀點範圍之，說「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人勿為。」以是墨子主張「非樂」，「節用」，「薄葬」；

與崇禮樂的儒家，雖不同調，但其兼愛利他的思想，在本質上和孔孟的精神尚少衝突，與歐洲近代樂利主義者「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之說，却最相契。墨子以為「仁人之事者，必務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天下之大患，在於人之不相愛，所以提出「兼相愛，交相利」之說於之。使知兼愛之道，不惟於他人有利，且亦利己。所以說「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蓋他就功利方面證明兼愛的必要，與儒家之從倫理着眼者，微有不同。然其主張「節本節用」，為百姓人民謀福利，至於摩頂放踵

，以自苦為極，純從平民立場，反對當時貴族之反動政治，而出之以犧牲的和革命的精神，不可謂非一時之「才士」。墨學雖不為後世君子所喜，然市井游俠之徒，則一脈相承，傳其衣鉢；太史公所謂「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者，正是此種兼愛利他精神的表現。

（三）生養之道 易稱「生生之謂易」，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明天地之化，無逾於生生；而轉入人倫日用之間，則為「生養之道」。孟子所謂「養生送死無憾，為王道之始」的理論，經過二千年後戴東原的發揮，而淋漓盡致，可說是從「生」的宇宙觀，推行而來。戴氏說道：

「飲食男女，生養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生也。」（原善上）

「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同右）

「聖人順其血氣之欲，則為相生相養之道。」（孟子字義疏證）

「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疏證中）

所以生養之道，在於遂欲：「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勝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則私而不仁。」但世人誤於宋儒「存天理去人欲」之說，致將理欲分為兩段，互相對立，發為政事，不近人情，喪心害理，寬抑細民，實有史以來生民未有之隱痛。戴東原有感一般社會深中宋儒之毒，於是發憤著「孟子字義疏證」一書，盡覆宋人之說，而提出有名的理欲一元論：

「理者存乎欲者也。」（疏證上）

「凡事者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於至當不可見之調理。無欲無為。」（疏證下）

「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釐不與之調理」。(疏證下)

因而達到「理存乎欲」和「欲當爲理」的結論。生養之道，不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導之使一於道義而已。宋儒矯枉過正，將人欲完全去盡，而以空洞的「天理」來衡量一切，結果遂如戴氏所說：

「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下，而在下之罪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主善的思想，與家道說他多事，宋學家又嫌其過激。所以這一偉大的啓示，在當時並未引起大的影響，直到近代西洋哲學輸入後，才被我們發現出來。這可稱爲「生學」的哲學，實我國最優良的文化傳統之一。(待續)

美國武裝日本的現階段

蔡振揚

美國扶植日本，已經從經濟而進至軍事的階段。最近，隨着遠東局勢的激變，美國再武裝日本的工作，也更加推行了。美國務院和陸軍部明白地指出：「假使中國局勢有變，那麼日本就將成爲北起千島羣島以迄南緯、琉球羣島及菲律賓的一道防線中的反共防哨站。」毫無疑義，美國已在「反蘇反共」的幌子下，積極進行武裝日本的政策。

據波茨坦宣言：「非至日本製造戰爭的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實可信的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指定，必須加以佔領。」遠東委員會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二日通過的對日政策基本原則，訓令麥克阿瑟總帥「積極使日本解除武裝，並廢止軍政，日本將無任何陸海空軍，秘密警察組織，或任何民航機構及憲兵，而僅有適當的民事警察。日本帝國大本營高級官員以及極端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機構的參謀領袖等應予拘捕，並再作處置；所有戰犯，均應施以嚴格的裁制，其中包括以殘酷手段施諸聯合國戰俘的戰犯；日本戰事力量之現存經濟基礎，應予消毀，日本不准生產旨在維持軍事力量或軍事設施之貨物；日本不能從事於有助於發展軍事力量之任何研究。」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遠東委員會

宣布一個第四十七號決策——「禁止日本軍事活動及處置日本軍事設備，共列七項，訓令麥帥執行，重要的內容是：(一)日本須解除武裝，僅得保留步槍、手槍、獵槍及警察所用其他小型武器。(二)日本在管制期內，不得自造各種飛機。(三)日本不得建造各種軍艦或輔助艦，並不得將其他船隻改造作軍用。(四)解散日本軍事組織，任何時期不得重設陸海軍部及最高軍事會議等，並應禁止各種軍事教練。可是，事實上，日本有恃無恐，不理遠東委員會。麥帥當然更不執行遠東委員會的訓令。

日本究竟是怎樣進行再武裝呢？

先就陸軍說：戰前日本陸軍的常備軍約爲廿三萬名，警察約六萬一千餘名，合計約近三十萬人。由戰後到最近，據官方發表的警察數字，計正規警察三萬名，自治警察九萬五千名，合計十二萬三千名，一九四八年五月間則增加八千名，共十三萬三千名。麥帥總部警政課長安頓，認爲現在在日本警察每五名佩槍一支，實嫌不夠，應每名一支。據調查，警察的成份，一部份是過去老警察。一半以上是復員軍人。如果每名都佩槍一支，那末三十萬名警

察便成爲三十萬名武裝人員，相當於戰前常備軍警察的合計數。最近美國尤其訓練所謂「特別非常部隊」，這在本質上當屬訓練正規軍無疑。而指揮警察的最高機構，即轄於首相的「國家保安委員會」，實爲變相的「陸軍省」。各地「警官區」則爲變相的軍管區。一九四八年五月成立的「警政大學」，是變相的士官學校或陸軍大學。此外，日本戰時軍事幹部，現在一部份收容在採取完全軍事編制的「開拓團」中，在一九四七年底止，估計有十二萬四千人。另一部份則乾脆組織法西斯團體，據日本警察所調查，全國計有一千二百六十個。

最近，「東京方面美國官員透露，日本警察早已擴展至十二萬五千人的限額，此項限額已被中國及蘇聯攻擊爲『新軍隊』，但美國則認爲不足。」(合衆社十二月十四日東京電)。美第八軍軍長艾契堡更指出有建立目的在警備的配備精良的日本國防部隊的極端重要性。他提出了兩種可能辦法：(一)武裝現在全部日本警察十二萬五千人，並將其數額增至十五萬人；(二)建立全新的保安隊，人數至多爲十五萬人。據說，美國當局正根據艾氏的主張考慮在日本建立十萬人至十五萬人的武裝警

察軍隊。

其次，就海軍方面說：一九四八年初，美國藉口防止走私，曾將海艦及驅逐艦二十八艘交與日警使用。日本市府並希望保有適當的海防隊，以應付海盜及走私活動。到了四月，麥帥總部又藉口加緊海面犯罪管制，及對私人入境韓人採取嚴峻防止行動，於五月一日成立「海上保安廳」，以大大保健夫為廳長，該廳以「保安處」為基幹，附設有「參謀處」、「航行處」、「燈塔處」，在小樽、鹽灶、橫濱、新潟、名古屋、無錫、神戶、廣島、門司等大城市均設辦事處。該廳的武力，暫定為海上保安警察八千人，武裝巡視艦三十八艘，將來再將艦隊擴充至一百五十艘，保安警察增至一萬人。為避免英國海軍的覬覦，該廳暫設於運輸省內，一俟時機成熟，再遷到大改組，而直隸內閣。由此看來，「海上保安廳」實為變相的「海軍省」。此外，日本還有掃雷艇一百艘，從事於掃除在大戰期間敷設於日本內海的六千八百六十六枚水雷。有一個美國海軍專家認為日本沿海的水雷，非要四五十年長的時間不能掃清。海上保安廳長大久保健夫也說：該項水雷刻已掃除三千一百三十二枚，尙未掃除的三千餘枚中，有一千五百枚為磁性水雷，除目前速度，需再二十年，方能將之肅清云云。原來日本人非常狡猾，他們的掃雷工作進行得很緩慢，無疑的，掃雷愈緩，愈有利於日本人，這是誰也明白的事。

至於日本主要的軍港，不但完好無恙，而且將美式化，和美國的大軍港媲美。一九四七年，美軍委員會曾建議，將橫濱、吳港、佐世保三個主要軍港，應交給美國用作海軍基地，日本人正以此等港口將按照美國標準建設而自傲。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藍姆賽會公開在珍珠港說：「日本在佐世保、吳港與橫濱實的海軍基地，再加上沖繩島、瀨

島的基地，合在一起，可以形成美國強大的前進基地網。」

再就空軍方面說：一九四八年初，日本當局曾表示希望取得若干小型空軍以輔助警察及海防隊。事實上，日本空軍基地仍健全存在，美國記者 David Conley 早已報導在日本仍到處可見飛機場、防空設備與地下工廠。美國在日本增開所謂戰略的飛機場，是非常秘密的，最近美國曾化了一千三百萬美元的巨款，動員數千日本男女，在本州北部青森地區進行築造一個「強大空軍基地」，迄至一九四八年五月初，已完工百分之六十，年底可以全部完成。該機場名喚三澤，位於東京以北三百五十航空哩。該機場長度為九千五百公尺，有鋼骨水泥跑道八千五百公尺，可供現在止在美國製造以及尚在計劃中的最大最速飛機的活動。這件消息由於約時報洩漏了出來，美國當局也祇好加以承認了。

此外，美國通訊社曾透露：「美國將日本神風隊飛行員秘密運到美國訓練。」一九四七年五月，據蘇聯真理報東京專訊：「據東京消息：在日本美國佔領軍當局，現正徵募前日本飛行員，包括所謂神風機駕駛員在內。美國佔領軍當局支給日本飛行員的月薪有高到一萬日元者。此等飛行員現正在埼玉等縣之機場受夜間飛行訓練。徵募之舉現正在北海道、四國、埼玉、羣馬與東京等縣分別舉行。受徵募的飛行員在布佐、熊石、太田等機場受訓。日本飛行員已組成特別航空部隊，飛行則於夜間為之。」

以上這些事實，明白地告訴我們：日本再武裝已經表面化了。

過去，美國當局對於扶植日本的政策是秘密的，或半公開的，但是，現在的情形完全改變，美國已經明目張胆地表示：必須武裝日本作為遠東的反

共基地了。「目前所有種種跡象，足見美國之政策，抵制共黨決以日本為基地，而以亞洲大陸為基地。此間不少觀察家均抱此項意見，愈信此種政策將來將日益顯明。此項政策非有不測之轉變（如決定對南京政府更作一次最後援救），當不致重大變化。」（合衆社十二月十日東京電）。又據「紐約時報」軍事專家鮑德溫自華盛頓發出的快訊說：麥克阿瑟將軍之意見，認為中共軍的進展，實難遏止。據稱：麥帥列舉中國政府軍失利後，美國在遠東地位已發生若干變化。麥帥曾建議增加美國在日本及太平洋美屬各島嶼的軍力。據「每日郵報」通訊員自紐約發出的電訊稱：美國各戰略家現正根據麥帥之警告，從事研究重新武裝日本的前途，用以抵消共軍征服中國。據稱：「美國最高統帥部正考慮使用日本人力，改造日軍，由美軍官率領之。但日本重整軍備應受嚴格限制及管制，使其不致再威脅世界和平。」（法國新聞社十三日倫敦電）。據傳：「數月前麥帥贊成將佔領軍所未使用之大批軍事物資援助中國政府。但目前局勢已變，在數月前被認為剩餘或不能使用的物資，現已視為對防務重要者。例如C五四型飛機零件已取出應用。鑒於局勢在變，麥帥已要求強力的增援，並要求美政策制定者考慮武裝日本。」（合衆社十三日紐約電）

國際觀察家也指出美國要成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遠東集團，「紐約郵報」評對日政策時說：「照當局的對日的佈置，企圖集中一切注意力來迅速改造日本，使之成爲一個軍事聯盟，已有極顯明的跡象。……美國現行對日政策，是要運用全部資源，技術力量 and 軍事援助，來使法西斯主義在日本復活。」

總之，美國這樣不顧一切的武裝日本，已經撕毀波茨坦宣言，播種侵略戰爭的

「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釐不爽之謂理」。(疏證下)

因而達到「理存乎欲」和「欲當爲理」的結論，生養之道，不外一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導之使一於道義而已。宋儒矯枉過正，將人欲完全去盡，而以空洞的「天理」來衡量一切，結果遂如戴氏所說：

「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下，而在下之罪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其言之沈痛若是，真是三百年來最大胆的人本

美國武裝日本的現階段

蔡振揚

美國扶植日本，已經從經濟而進至軍事的階段。最近，隨著遠東局勢的激變，美國再武裝日本的工作，也更加推行了。美國務院和陸軍部明白地指出：「假使中國局勢有變，那麼日本就將成爲北起千島羣島以迄南緯、琉球羣島及菲律賓的一道防線中的反共前哨站。」毫無疑義，美國已在「反蘇反共」的幌子下，積極進行武裝日本的政策。

據波茨坦宣言：「非至日本製造戰爭的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實可信的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指定，必須加以佔領。」遠東委員會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二日通過的對日政策基本原則，訓令麥克阿瑟總帥「積極使日本解除武裝，並廢止軍政，日本將無任何陸海空軍，秘密警察組織，或任何民航機構及憲兵，而僅有適當的民事警察。日本帝國大本營高級官員以及極端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機構的參謀領袖等應予拘捕，並再作處置；所有戰犯，均應施以嚴格的裁制，其中包括以殘酷手段施諸聯合國戰俘的戰犯；日本戰事力量之現存經濟基礎，應予消毀，日本不准生產旨在維持軍事力量或軍事設施之貨物；日本不能從事於有助於發展軍事力量之任何研究。」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遠東委員會

宣布一個第四十七號決策——「禁止日本軍事活動及處置日本軍事設備」，共列七項，訓令麥帥執行，重要的內容是：(一)日本須解除武裝，僅得保留步槍、手槍、獵槍及警察所用其他小型武器。(二)日本在管制期內，不得自造各種飛機。(三)日本不得建造各種軍艦或輔助艦，並不得將其他船隻改造作軍用。(四)解散日本軍事組織，任何時期不得重設陸海軍部及最高軍事會議等，並應禁止各種軍事教練。可是，事實上，日本有恃無恐，不理遠東委員會。麥帥當然更不執行遠東委員會的訓令。

日本究竟是怎樣進行再武裝呢？

先就陸軍說：戰前日本陸軍的常備軍約爲廿三萬名，警察約六萬一千餘名，合計約近三十萬人。由戰後到最近，據官方發表的警察數字，計正規警察三萬名，自治警察九萬五千名，合計十二萬五千名，一九四八年五月間約增加八千名，共十三萬三千名。麥帥總部警政課長安頓，認爲現在在日本警察每五名佩槍一支，實嫌不夠，應每名一支。據調查，警察的成份，一部份是過去老警察。一半以上是復員軍人。如果每名都佩槍一支，那末三十萬名警

主義的思想家。宋學家又嫌其過激。所以這一偉大的啓示，在當時並未引起大的影響，直到近代西洋哲學輸入後，才被我們發現出來。這可稱爲「生學」的哲學，實我國最優良的文化傳統之一。(待續)

察便成爲三十萬名武裝人員，相當於戰前常備軍警的合計數。最近美國尤其訓練所謂「特別非常部隊」，這在本質上當屬訓練正規軍無疑。而指揮警察的最高機構，即轄於首相的「國家保安委員會」，實爲變相的「陸軍省」。各地「警官區」則爲變相的軍管區。一九四八年五月成立的「警政大學」，是變相的士官學校或陸軍大學。此外，日本戰時軍事幹部，現在一部份收容在採取完全軍事編制的「開拓團」中，在一九四七年底止，估計有十二萬四千人。另一部份則乾脆去組織法西斯團體，據日本警察所調查，全國計有一千二百六十個。

最近，「東京方面美國官員透露，日本警察早已擴展至十二萬五千人的限額，此項限額已被中國及蘇聯攻擊爲「新軍隊」，但美國則認爲不足。」(合衆社十二月十四日東京電)。美第八軍軍長艾契堡更指出有建立目的在警備的配備精良的日本國防部隊的極端重要性。他提出了兩種可能辦法：(一)武裝現在全部日本警察十二萬五千人，並將其數額增至十五萬人；(二)建立全新的保安隊，人數至多爲十五萬元。據說，美國當局正根據艾氏的主張考慮在日本建立十萬人至十五萬人的武裝軍

種籽。日本已經公開的再武裝，向着軍國主義之途邁進。無疑的，日本的再武裝，對於中國的威脅尤

大，中國當然是侵略對象之一，為着珍惜抗戰八年所獲得的勝利成果，為着防止再度遭受侵略，為着

保障遼東，再武裝！

且不堅決反對日本的

通 訊

激盪中的南京政局 (南京通訊)

本社記者 冷漁

和平「推門」成功了

立法院大會在京召開了，行政院正副院長同京了，南京的車馬輻輳，又是一番新的景象。形勢逼人強，李代總統的和平攻勢，戰勝了廣州國民黨的死硬派，李代總統和支持他的人，正期待和平成熟的果實。南京的人對他

有期待，中共對他也有期待，連他自己也有期待；甚至很不知趣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他亦復有期待，將來李代總統究竟走向那方面，滿足那一方面對他的期待，確乎要看他的做法了。

現在，我們且看以李代總統為中心的政局發展，其內意與發展是什麼。

中共對李宗仁的期待

先前的，中共對李宗仁的和平攻勢是不諱解的，認為他回蔣總統的備戰，是一體兩面的。並且懷疑李的背後，有美國人作支援，意圖在未來聯合政府中安排一個反對派，或者說美國的陰謀企圖製造一個南北割。後來由於美經編多次飛港與中共代表團的洽談，及陳慶慶江甫宇劍及邵力子四人的實地北平北平莊，與中共各領袖多次的會晤，中共在顧維鈞介紹詞中，比較瞭解了李宗仁，他對和平的努力是相當具有誠意的；可惜李宗仁的處境很艱困，實力又缺乏，甚至一月廿三日頒佈的四項措施（又缺乏詳細和措施），命令也不出京門，上海台獨的事實表現，恰恰與李代總統的文告完全兩樣。據說，中共已經

認識了這一點，比較對李宗仁有了瞭解，並且相當佩服他（北平的傳佈義便不相信李宗仁會弄假，更不相信李會同死硬派表演一套變節）。

中共對顧部等表示，和談應該迅速舉行，時間愈快愈好，外傳和談時間定為三月十五至二十日，并非毫無根據。對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氏聲明的八項條件，要不折不扣的作為談判的基礎，不過這八項條件，僅是六項原則，既然而以平等商討之，自然不是無條件的接受，仍有折衝商討之餘地。這一點，是顧部四人北行推門的最大收穫。

不過，和談未舉行之前，和平環境很重要，據說中共提出了幾項先決事項，期待李宗仁在和談之前條件做到，一以割白他對和平的誠意，一以開拓和平的環境，增加真正和平的空氣。由於消息的封鎖，顧部四人的守口如瓶，局外人很難知道這幾項先決事項的內容。記者茲從某權威方面獲悉，中共非正式的對李宗仁期待的先決事項，大約有下列幾項：

(一) 實踐一月廿三日四項文告的諾言，取銷或嚴令，保護人民身體自由，釋放政治犯，特別要釋放張學良楊虎城；

(二) 停止徵兵徵糧，並要停止華南東南及四川的新軍訓練的備戰準備；

(三) 中共於和談之前，先要解放西安和武漢兩市；

(四) 拒絕新美援。

李代總統覺得這幾項的負担很沉重

為他的力量所不及，所以他想奮爭取得應欽的合作，最廣召各省實力派督軍，共商大計。據說中共尚有一項暗示，即蔣總統之早日出洋，是比較便利和談的，因之李代總統又提請張治中吳忠信兩人去奉化，相繼向蔣總統請項，中共吳忠信兩人去奉化，知張吳奉化之行，毫無所獲，今日南京政局特別顯得不安了。

由於和談有希望，由於各地實力派支持李宗仁，南京政府為了進行和談，特設十人委員會負責起草和談方案，以對毛澤東內部各派領袖（除去CC派），經過幾度意見交換，特組三小組研討毛氏八項條件的對案，計（甲）軍事小組由何應欽、張治中、劉斐負責整軍方案；（乙）政治小組由張羣、邵力子、吳忠信負責研商廢除戰犯，廢除憲法法統問題；（丙）外交小組由孫科、吳鐵城、朱家驊負責搜集有關賣國條約之處理問題。十人委員會以孫科為主委，鍾天心為秘書長，一俟初步意見草擬後，再揚中政會討論決定，交由政府和平代表負責折衝。照這個程序看來，將來和平代表的權責很小，責任頗大，它必須受原案和中政會的約束。

十人委員會對毛澤東八項條件所持的態度是這樣：

(一) 他們認為中共對「懲辦戰犯」一項，必須讓步，現在頒佈的戰犯名單有欠正確，應作重大修正，同時他們相信中共對於「懲辦戰犯」的要求，大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所以并不十分悲觀；(二) 憲法可以修改，應憲法而產生的法統亦隨之變更，不過未來法統和制度，無論怎樣變化，不能約束人民自由生活的方式，他們很堅強持守見，深慮蔣來的無階級專政妨礙其他階級合理的生活自由；(三) 國民大會及立法院可以解散；(四) 土地改革及接收官官資本問題，他們認為政府亦曾有此舉，惟未能徹底執行，此兩項問題應無異議；(五) 所謂廢止賣國條約，究竟何項條約為賣國之契約，或有賣國性質，當於和談檢討之後，由政府予以廢除，亦非不可能，比較困難的問題，是(六) 軍隊的整編，應在合理平等之原則下，雙方軍隊同樣進行整編，不贊成由共方編國軍。若干人士之意見，以為雙方軍隊最妥當的辦法，是實行「分治」原則，然此辦法勢難通過，且易形成軍隊的密封性割據性，因此決定不提出。後來參照政治協定通過整編統編中共軍隊的方案，決定雙方軍隊之編制，應以「由整編到統編」為原則，藉以達到合理平等；所謂「整編」即雙方各將所有軍隊自行整理縮編減少至最低限度，因目前國富民力均不容許有數百萬大軍常用人民的興業；所謂「統編」一俟雙方軍隊於自行整編完畢之後，再予統一編制，成為國家的武力。據說這個原則的主旨，不論整編統編，既非如政局時代之五一辦法，將共軍編入國軍，亦非如傅作義式之被改編，將國軍廿五個師編入人民解放軍（即三月一日陳北電台廣播的改編辦法），而係依據平等原則的「統編」編制，而無損於國軍的一種編制。

十人委員會不贊成傅作義式的「改編」，而主「由整編到統編」的理由有三：

(一) 政府在軍事上并未完全戰敗，當不能被改組；(二) 長江以南的情形，同作戰當時被包圍的出現情形，顯然不同；(三) 政府有自由活動發揮能力的海空軍。預料軍三項理由，將來必不為中共接受。因而軍政處理問題可聯席或將來和談時的障礙，甚且雙方談到破裂，又重以兵戎相見，亦大有可能。不過有人對軍政處理問題的態度相當樂觀，他們認為毛澤東的聲明數，整編軍政要根據民主原則，所謂民主原則，當然是合理平等的原則。

立法院的倒閉運動

隨政局演變而來的政潮，是立法院的倒閉運動，勢如洶湧，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立法院定八日正式開會，到會的立委超過了三百人，尙有多人在東京的途中，儘管廣州上海的C派立委多不赴京，而重慶的領導力是足可控制全局的。

立委倒閉運動，以民主自由社和三青團及劉不同武和軒等為主力，他們的倒閉，非常準備有計劃，他們抓住孫內閣的貪污腐敗，及孫科出賣上海私宅和發還監察財產諸事，指控孫科的無聊貪鄙，然後在施政方面攻擊孫科，一切措施失當，和戰後腐敗，逼迫孫科「光榮的引退」，并以廣汎發給著名為武器，預備在八日開會時，于孫科重慶大廳，使他無地自容，不能不來，不過他們要防止孫科逃遁。因為孫科很可能逃往重慶。

孫科身處四面楚歌之中，除了蔣總統陳立夫轉請上「光榮」的支持外，他祇有兩途可擇：即自動辭職或被逼去職。在七日以前，有許多代表性的立委，勸孫自動辭職，孫雖有這個去意，但劉維燧煽惑，使他堅持不去，致法法連八日以後的鬧劇。如果八日開會孫科出席施政報告時，他不向立法院宣佈辭職，立法院孫派人物確乎可能逼他下台，甚且打個頭破血流。孫科的立委會裡多方疏通反對派，結果都失敗了。孫科內閣之倒，勢已成爲

必然的趨勢；除非李代總統出面支持政軍出現奇蹟，孫科纔不會倒的。

現在南京人士關心的，不是孫科倒閉的問題，而是繼任者誰人選問題，大家揣測不定。孫科內閣無疑是備戰內閣，繼來者必要和平內閣，而這個和平內閣的首領，必要軍人（元老性的軍人），因為和平成功後屬於軍事善後問題，非元老軍人不能控制紛亂的局面；祇要看他表日投降和平時的情形便知。今天南京政界軍人

危機四伏的川康

本刊成都特約通訊

在戰亂到最後關頭，張羣奉命返川出任重慶綏靖主任，準備控制西南各省，再作將來復興的根據地。大事，對於川康兩省的反應是重大的。兩月來該省紛紛，成都一度密佈戒嚴，大小一觸即發之勢，即知運度大事的影響不小。由於張羣的疏解和緩衝，緊張的局面表面緩和了，實際上仍潛伏着重大的危機。事情真像如何，寧有報導必要。

政府與地方的對立

川康兩省是民國以來政潮最多的地帶，剛省在抗戰期中，因為張羣與閻樞樞之術，得以平安渡過。勝利以後，張將四川省主席的寶座讓與鄧錫侯，鄧為川中宿將，早有「水晶駝子」之稱，他對四川的統治，確乎四平八穩，一方面與西南主席劉文輝合作，聯成一氣，另一方面又能駕馭多數的立憲委員和省議員。惟自王陵基由江西調任主席後，川康情形大變。王有鑒官的經驗，個性極強，剛硬自用，調閱閻錫侯，排斥鄧錫侯（均為鄧錫侯係系人物），又為一部份不滿，同時啓用復興社的人員，更引起與王同系廿一軍的舊同參軍切切，因為這種種內在因素，軍在省

中，能通任下屆首領的軍界前輩，除了何應欽以外，祇有張治中。何比張能控制更多的實力派，不過他對組閣的信心不夠，聽說他回上海去休息，便爲了躲避這件事。不過，他向李白的私啟甚爲理想，張治中未便繼任首領的話，何應欽當是理想中的人物。又有人相信，除了何張二人以外，或另有他人出面組閣，以支持李代總統的和平政策。

總之，大局在變，南京在變，形勢此

議會出席，便爲一般民意代表所厭惡而大肆質問。四川參議會本是地主和商賈集團，而今天地主商賈對政府，恰與政府形成對立，所以參議會痛恨政府，事事與政府對立。四川有八個保安團，就有六個團長聯名反抗王主席，這都是地主支持地方實力派的一種反動。有人說，鄧錫侯代表地主利益，王陵基代表中央團派利益，此種說法相當不錯。

其次，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的意見與主張，往往與王頗有出入，王因此疑神鬼，認定許多黨員代表對他不滿，至少與劉文輝等在暗中鼓動有關。所以他對大報的記者說：「我這個主席，不是亂亂亂說或印發小冊子所能決定的。」目前的川康政局，基於王劉不合之作，引起地帶的不安，同時，川人對於中樞當局，因徵兵徵實乃數過多，早已增加各方憤憤，兼之四省聯防的聲浪，和鄧和平影響，使成都重慶正醞釀着「一種『大川康主義』」，所謂大川康主義，就是要以川康的兵源與糧食，來保衛川康，此外，川東華山一帶的土匪，成軍出沒，而孔部亦不時有乘隙竄川的企圖。

政潮回復平靜的內幕

正當川康政局動盪不安之際，張羣

較有利於李宗仁；如果李宗仁具有和平誠意而不接受美國援助的說，李宗仁還一次的成功，他將伸出有力的手，同中共談判和平，說不定還談到成功的希望。反之，中共必將渡江，長江以南；是則全股局勢，又將有不景的變化了。前途如何，此際尚難預卜。

(三月七日冷淪寄自南京)

苦果

有一重大使命，入川了，接着又有胡宗南入川的謠言，於是川康人民一致不安。正在此時，中央軍校成都分校在城郊作演練戰鬥演習，表示對川康人民示威，於是劉文輝便由西康調兩師兵力，到達川康公路線，并一度進入成都市，人們感觸這次政治鬥爭，持以演變成軍事鬥爭，即地方與中央的鬥爭。

謠言傳到重慶，張羣開始變態了。張於二月十四日偕王陵基飛抵成都，與川康將領，共商團結大計，張羣留蓉三日，遍訪社會耆宿，並與劉文輝、王陵樞、王陵基等數度密談。同時出席省委會，立監國代聯合歡迎會，一再強調川康一家，必需精誠團結，方克善應變局，經過一番坦白會晤川局混濁的謠傳，爲之澈底澄清。及張偕王返，劉文輝向傅秉常等夜聯袂赴渝參加張氏就職盛典，張并聲言要成立西南政務委員會。川康將領雲集陪都，歡敘一堂以後，事情之離奇，如此說明張與川康將領在某些問題上獲得了妥協，張與川康妥協的最大實效因素，是國共與蔣似有了希望，共軍停滯江北未渡江攻取，致使反中央的地方將領，不能不認氣使舵。

吳八川

中央對於四川... 南四省(川康滇黔)...

川康局而在變 中央爲了要面觀，決定在四川徵兵四十三萬...

不遠，大局急轉直下，新中國誕生已爲時不遠...

價飛漲，徵兵徵糧，忿於星火，大多數人民不是陷入飢寒交迫...

解放區的貿易制度怎樣？

本刊特約香港通信

們不妨隨便談談。 商人：照你的看法，解放區的貿易管理，是依什麼原則？

記者：從兩個條例的內容中，我們看出，解放區的貿易是有管理的，其管理原則，據管理辦法第一條規定：『爲保護進出口貿易，以發展生產，支援戰爭，特訂製本辦法。』...

記者：做生意的事情，你知道的比我多得多什麼地方還覺得不夠明瞭之處，我

光洩

二、施行什麼貿易制度 商人：依照什麼辦法條例，你以爲解放區的貿易是怎麼管理的？

記者：照你這辦法條例，我來試着問問。出口貨物，除統制品外，其餘自由出口。進口貨物，除統制品外，其餘自由進口。...

三、公營和私營

商人：獨佔權是有統制品的規定，是由政府來管理。私營的規定，是由市場來管理。...

